

## 矛盾统一：犹太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sup>\*</sup>

伊扎克·希霍尔<sup>\*\*</sup>

洪 韬 肖 宪<sup>\*\*\*</sup>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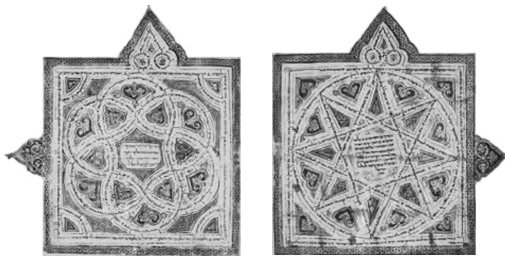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摘要】**犹太人深深地卷入了欧洲的共产主义革命，尤其是在俄罗斯，他们往往是革命的领导者。这很容易理解，因为犹太人生活的地理位置、接受的良好教育以及长期以来遭受的苦难。然而，我们如何解释他们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中同样也发挥了作用呢？那里几乎没有犹太社团可言，生活在那里的少数犹太人几乎被完全同化了，他们对中国文化、历史和政治毫无兴趣。尽管如此，（来自中国以外的）犹太人不仅参加了中国的革命，而且还帮助点燃了革命的烈火，他们有的继续留在了革命队伍中，有的则是后来加入了革命队伍。尽管我对此感到困惑，但在本文中我仍将尝试对中国的犹太活跃分子和革命者进行分类，解释他们的动机（无论是否出于主动选择），并尽可能地评估他们的贡献。尽管看起来犹太身份在他们的革命活动中并没有发挥什么直接影响，但却起到了间接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格舒尼、维经斯基、舒米亚茨基、鲍罗廷、越飞、米夫、柯鲁克、李敦白、爱泼斯坦、沙博理、爱德勤、金诗伯、夏皮洛等人。他们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集中于写作、翻译、沟通和出版。

**【关键词】**犹太活动家；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犹太身份；Tikkun'Olam（改造世界）；犹太革命

\* 原文发表在《国际中国研究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a Studies*)2020年第2期。

\*\* 伊扎克·希霍尔(Yitzhak Shichor)，海法大学政治学和亚洲研究终身教授，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迈克尔·威廉·利普森讲座教授。

\*\*\* 洪韬，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肖宪，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传道书》7:18)

在近现代历史上,犹太人参与激进的社会运动和革命活动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世界各地有很多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欧洲。犹太人不仅参加了左翼和共产主义运动,而且在许多运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一点在俄国革命中尤为突出。如果我们看到犹太人在当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17年俄罗斯大约有300万犹太人),就能看到他们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语言和文化,很容易理解他们在沙皇和其他压迫者统治时期所遭受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压迫以及他们的宗教背景、教育和知识水平。

与此同时,也有许多犹太人坚定地反对共产主义,维护资本主义。有时一些犹太家庭内部也会分裂成支持共产主义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两派。这种对立在西方很常见,在中国则不存在。中国犹太社团不仅弱小,而且对参加革命也毫无兴趣。中国一度成为逃避迫害和死亡的俄国和欧洲犹太人的避风港,这些人在中国得到了庇护、自由和繁荣。以前在中国定居的犹太社团中,最为人所知的是开封犹太社团,他们都被同化了。与英国关系密切的巴格达犹太人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定居在上海和香港;他们对革命毫无兴趣,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事实上,他们对革命几乎一无所知。社会主义思想在19世纪后期的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和大多数西方学说一样,社会主义思想通过日本传入亚洲,并被侨居海外的中国、朝鲜、越南知识分子和活动分子所接受。

最初,在“进口”到日本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想中,共产主义(以及马克思)对中国知识分子是最没有吸引力的。“阶级斗争”观念被认为过于暴力,与倡导和谐统一社会的传统儒家价值观是矛盾的。此外,“工人阶级”代表“普世”和“革命”阶级的思想,也与前现代中国人的观念格格不入。与亚洲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领跑者日本不同,“现代”中国仍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它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太弱小、太不发达,无法产生革命的条件和革命的动力。因此,知识分子们更喜欢西方的社会民主或国家社会主义,即按照传统价值观来进行统治,强调政府,强调以德治国和社会凝聚力。无论存在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反对力量和激进思想,都不是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来表达,而是按无政府主义来表达的。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毛泽东,都认为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这些面向日本后来又间接面向中国(和东亚)的无政府主义“传播者”中,有一位立陶宛籍的犹太活动家格里戈里·格舒尼(Grigory Gershuni)。

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不同,格舒尼是一名职业的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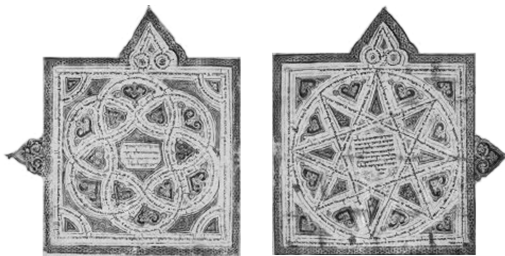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第23辑

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犹太革命者一样,他完全融入了俄罗斯文化,然而他却为自己的犹太血统感到自豪,并具有反击反犹太主义的能力,必要时甚至可以使用暴力。他是俄国政治解放工人党(Workers' Party for the Political Liberation of Russia)的创始人,经过1901年被捕后,他又成为社会革命党(SR)的共同创始人之一。1902年,他建立了党的武装组织,从事暗杀和恐怖活动。由于一名“同党”叛变,他于1903年被捕,一年后被流放到东西伯利亚涅尔钦斯克地区的一所监狱(劳改营)。在被捕前,他同意与立宪民主党人建立临时联盟。1906年,他靠藏在一个酸菜桶里逃到中国,然后又去了日本。他在日本遇到一些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战俘和亚洲的活动家(如孙中山)。这也许是亚洲“革命者们”第一次了解到现实中的无政府主义。当时社会主义并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它与民族主义无关,而且缺乏发动革命的组织工具。格舒尼提供了一些工具,将无政府主义改造成了20世纪初东亚最流行的西方意识形态。但是不久后,无政府主义就被列宁主义超越了,列宁主义为民族主义和组织形式这两个难点提供了解决办法,从而触发了中国的共产主义,并导致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的革命运动。格舒尼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只倡导革命的一个方面,即革命的破坏性,而没有倡导革命的建设性。格舒尼的主张最初使中国的激进派印象深刻,但后来却发现它是消极和不可接受的。

传统观点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起源于五四运动(1919年)。人们听说凡尔赛会议决定将山东的一部分(原先是德国的租借地)交给日本,因此感到很失望。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表达了他们对西方列强的愤怒,特别是对美国、对威尔逊总统的“出卖”感到愤怒,这显然导致学生和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俄国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是被称为“‘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反帝思潮的直接产物”<sup>①</sup>。然而,事实可能并非如此。1922年,日本将山东还给了中国。华盛顿的“出卖”就被遗忘或忽略了,美国也开始与“中华民国”交往。此外,知识分子思潮或意识形态也不能取代组织。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并非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选择,然而当时却没有其他组织来宣传别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中国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选择,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或是对西方的反应),而更多的是因为布尔什维克的努力和第三国际(Comintern)的活动。第三国际正好成立于1919年3月,它派出的“国际代表”

---

<sup>①</sup> Tony Sa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Era of the Comintern (1919-1943),” in Juergen Rojahn, “Comintern and National Communist Parties Projec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https://www.academia.edu/24398395/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_DURING\\_THE\\_ERA\\_OF\\_THE\\_COMINTERN\\_1919-1943](https://www.academia.edu/24398395/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_DURING_THE_ERA_OF_THE_COMINTERN_1919-1943).



不仅传播苏联式的意识形态,而且致力于共产主义支部的建立,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是此时,犹太活动家开始在中国革命中发挥作用。他们的“犹太身份”从未直接甚至间接地对他们的活动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如此,他们的行动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如果不是有意识的,或许就是潜意识的——并且影响到了他们在中国的使命。他们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身份,努力通过解决矛盾、弥合分歧、调解对抗、团结统一,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从而将中国传统和犹太传统、东方和西方融合在了一起。

本文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集中讨论 1919—1949 年犹太人在引进共产主义、消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分歧中的作用。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进入中国的外籍犹太人在沟通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所做的努力。第三部分探讨后毛泽东时代犹太顾问在中国利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也是邓小平改革的主要内容,但也许无意中成了最终实现马克思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

## 一、1919—1949 年:沟通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

在 20 世纪第二个十年前后,犹太人在各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俄国革命中尤其如此。俄国革命前夕,第一届布尔什维克政治局的七名成员中,就有四名是犹太人:托洛茨基(Trotsky)、加米涅夫(Kamenev)、季诺维也夫(Zinoviev)和索科尼科夫(Sokolnikov)。其他著名的犹太人还有李维诺夫(Litvinov)、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贝拉·库恩(Bela Kun)。苏联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许多主要代表都是犹太人:维经斯基(Grigorii Voitinski,也叫吴廷康),鲍罗廷(Mikhail Borodin)、越飞(Adolf Joffe)、米夫(Pavel Mif)、尼科尔斯基(Nikolsky)<sup>①</sup>、舒米亚茨基(Boris Shumiatsky)和其他一些人。由于犹太人没有祖国,便可以克服民族主义感情,接受普世主义观点。犹太人也不需要皈依或放弃宗教,因为共产主义是反对宗教的。而犹太人可以很容易接受另一种文化和意识形态,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它来代替他们所缺乏的那种民族性文化。对他们来说,中国在地理和文化上的遥远无关紧要。作为一种普世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适用于所有国家。犹太人不受限于排他性的民族情感,可以(而且有人认为是应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地方发挥革命作用。他们用自己的方式确实也做到了。

---

<sup>①</sup> 1921 年 7 月,两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个是马林(Sneevliet),另一个是尼科尔斯基(Nikolsky,犹太人)。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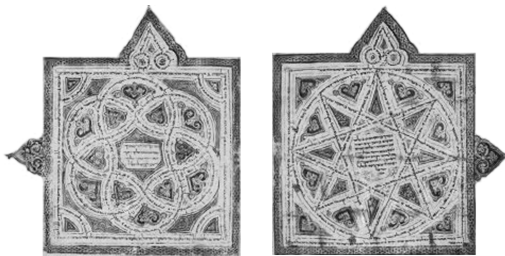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第23辑

鲍罗廷和维经斯基是第三国际派往中国的重要“国际代表”，他们的支持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不可或缺的。虽然鲍罗廷的任务是与国民党保持联系，但他最基本和最主要的使命是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原名叫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格鲁森贝格(Mikhail Markovich Gruzenberg)，16岁时加入了“崩得”(Bund,即犹太工人总联盟)，这是一个仍保持其犹太身份的知识分子组织。1900年时，它是俄国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就像大多数犹太革命者一样，鲍罗廷放弃了他原先接受过的一切犹太宗教教育和文化观念。也像他们一样，鲍罗廷不仅要让犹太人也要让全人类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是一个弱小的少数民族或社会民主党人无法实现的，而布尔什维克主义被普遍认为是要根除世界上所有的社会罪恶。

鲍罗廷在中国推动共产主义，靠的是他的组织能力、个人形象以及非凡的智慧和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尤其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他的正式身份是列宁派到中国作为孙中山的顾问，当时孙中山在广州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民族主义政权。鲍罗廷1923年抵达北京后，10月6日前往广州。国民党只是部分地接受了他传达的信息，包括土地分配、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工作日时间。他认为这些有关土地和劳动的改革可以作为联合共产党和国民党以及整个中国的基础。据俄国资料称，曾有几个可能持反犹立场的美国人问孙中山是否知道鲍罗廷的真名。据说，孙中山回答道，“我知道，他叫拉法叶(Lafayette)”<sup>①</sup>和其他曾到开封与犹太人后裔联系过的苏联犹太代表不同，鲍罗廷对此并没有兴趣。他的努力主要放在共产主义者身上，那些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迅速上升，这也要归功于他。

他坚持国共合作，这也反映了他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中国还不具备共产主义的条件，而且未来几十年也不具备。现在来看，他说的是对的。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然而当1926年3月蒋介石在上海开始打击共产党时，鲍罗廷就不再相信蒋介石了，而是在年底领导了武汉的革命。如果没有他，武汉政府就不会存在，也无法存活。为了躲过蒋介石的报复，鲍罗廷于1927年7月离开中国，9月下旬回到了苏联。一开始，由于斯大林的支持，鲍罗廷在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捕和处决。但是，随着斯大林的反犹主义和对第三国际在国外活动的怀疑与日俱增，鲍罗廷既是犹太人又是一名国际主义者，于是便成了被清洗的对象。他于1949年年初被捕，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最后于1951年5月29日在雅库茨克的监狱中去世，终年

<sup>①</sup> 拉法叶，一译拉法耶特，一位法国人，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于1777年志愿前往参加美国独立战争，曾任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的副官，被授予少将军衔——译者注。



67岁。一直到最后,他都赞成斯大林的统一战线政策。虽然多数学者以及中共领导人都认为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犯了严重的错误,然而,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以及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鲍罗廷的观点来看,斯大林或许是正确的。

鲍罗廷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是促成了国共合作,这也意味着资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这一点被毛泽东(以及后来也被斯大林和多数“共产主义”领导人)所忽略,然而,一些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欧度过他们青年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却赞同这一点。这些领导人包括周恩来、朱德、陈毅、李富春,尤其是邓小平;他们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就认为,要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首先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邓小平为首的领导人在毛泽东去世后实施经济改革和自由市场政策,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打下基础。<sup>①</sup> 尽管这与鲍罗廷所设想的并不完全一样,他始终认为与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合作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基础。

鲍罗廷的观点得到了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Adolph Abramovich Joffe)的赞同。越飞曾短暂地担任苏联驻北京政府大使(1922—1924)。他参加过1917年的十月革命,之后担任过多个职位(副外交人民委员、驻德国大使等)。他出生于克里米亚的一个犹太教卡拉派家庭<sup>②</sup>,曾努力说服孙中山相信莫斯科。像鲍罗廷一样,他认为共产主义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地方)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是有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对于孙中山来说,这也是他的一项基本政策,因为他依靠富有的资本家。然而,越飞的游说却被拒绝了,这其实也是获得苏联支持的条件之一。孙中山说,中国不能引入共产主义和苏联模式,越飞对此也表示同意。于是,他转而强调国家统一和独立的重要性。他推动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承认以及国共两党的合作,将此作为苏联支持国民党的先决条件。<sup>③</sup> 事实上,正是在越飞抵达中国不久后的1922年9月,孙中山接受了第一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sup>④</sup> 越飞的政策被苏共政治局所采纳。越飞因身患重病而离开了中国,后来成了斯大林的政敌托洛茨基的盟友,于1927年11月自杀身亡。

虽然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先就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但却

<sup>①</sup> 1952年年初,周恩来带领一个团队起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包括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都亲历了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资本主义。

<sup>②</sup> Albert S. Lindemann, *Esau's Tears: Modern Anti-Semitism and the Rise of the J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30.

<sup>③</sup>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54-63, 80.

<sup>④</sup>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57, 105.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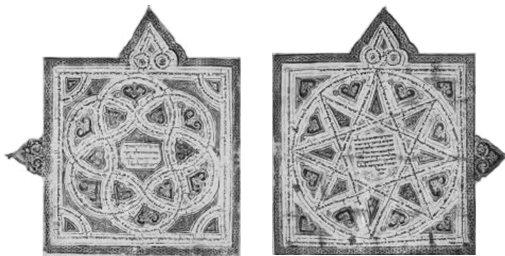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是以格里戈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为首的第三国际代表们将其转变为有组织的行动,是他们开始着手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并不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第三国际代表,在他之前还有马林、伯特曼、波波夫和阿加廖夫等人。但维经斯基是最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是“第一个”。维经斯基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sup>①</sup>当时,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已经在流传,然而在1920年4月维经斯基(时年27岁)来华之前,还没有人采取过任何行动。

1893年,维经斯基出生在俄罗斯涅韦尔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叫格里戈里·扎尔金(Grigorii Zarkhin)。布尔什维克革命后不久的1918年,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加入了共产党。1920年,他成为第三国际远东局副局长并前来中国,见到了后来成为中共领导人的陈独秀和李大钊。虽然陈独秀早在1918年就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但他对其他思想(如联邦主义)也颇感兴趣。只是在遇到维经斯基之后,他才开始投身共产主义,不仅在理论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行动上。陈独秀在与维经斯基会面后,组织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至少在不同的城市和省份建立了七个小组。维经斯基支持和推动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不仅为党组织的建立铺平了道路,而且也向中国知识分子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打下了基础。<sup>②</sup>事实上,在维经斯基来中国之前,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就已经存在了,但理论学习团体与真正有组织的政党之间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要组织一个政党,还需要有外部的专业支持。以维经斯基为首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便提供了这样的支持。维经斯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里出现的反美情绪中,更重要的是,也体现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并最终获胜的斗争中。1920年8月,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而在此前的5月,也就是他到达中国不久之后,他就鼓励一批知识分子秘密地建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应该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

---

① Yoshihiro Ishikawa,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95-119; Hu Yunxia and Li Shaohua, “The Contribution of Voitinski,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Bolshevik) Communist Par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0 (2009): 87-92.

② Bruce A. 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Kun Chen, “Voitinski’s Visit and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8 (2016): 25-27; Lu Mengyao, “Voitinski and the Propag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Journal of Nant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hipping College* 13 (2014): 15-18.



真正日期,尽管后来正式日期被定为 1921 年 7 月。”<sup>①</sup>

最后,中国革命者不仅在中国受到苏联的影响,而且在苏联也受到影响。随着 1925 年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创建,第一批约 340 名中国学生(既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抵达莫斯科。卡尔·拉狄克出任第一任校长。他于 1885 年出生于利沃夫的一个犹太家庭,原名叫卡罗尔·索贝尔松(Karol Sobelsohn)。他年轻时是一名坚定的左翼分子,但后来倾向于修正主义,看重资产阶级的价值。1922 年,他在加入第三国际执行委员会后,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交给在中国的马林执行。该决议隐晦地承认了国民党和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潜力。当时包括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内的许多人都反对这个决议,但拉狄克不仅支持并且起草了该决议,还投票使决议以多数获得通过。<sup>②</sup> 1925 年,拉狄克被认为是一名中国问题专家,他也确实深入研究过中国。虽然他从未去过中国,却讲授了中国革命运动史。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他肯定对中国学生产生了影响,包括左右两派学生。为了强化他对国共合作的倡议,他声称受外国帝国主义的影响,中国沿海地区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出现了近代资本主义。他还认为,地主所有制(landlordism)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封建主义。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弱小,因此国共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他在 1925 年说过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前景的一句话,现在可以看作一种预言:在革命斗争中,中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一起,“将暂时被迫以资本主义的方式去发展土地经济实力”<sup>③</sup>。

然而,1926 年,拉狄克开始(或被迫)改变自己的看法,至少表面上如此,这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出现了蒋介石残酷的反共政策,二是斯大林的坚决反对。在莫斯科中山大学里,拉狄克及其支持者们不得不遵循“党的路线”,但他们仍然有一些表达自己观点的空间,他们也确实这样做了。拉狄克的书和其他著

<sup>①</sup> 中国的资料更倾向于认为,陈独秀在李大钊遇到维经斯基之前就已经讨论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强调党是发源于中国而不是苏联。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48. 也有学者认为,“然而,我们不能说陈和李在维经斯基到达中国之前就讨论过组建共产党”(Yoshihiro Ishikawa,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103)。

<sup>②</sup> 最初,托洛茨基也支持这个“在一定时期内是正确和进步的”决议。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47, 51, 102, 105, 114.

<sup>③</sup> Karl Radek, “Voprosy Kitaiskoi Revoliutsii,” *Krasnyi Internatsional Profsoiuzov* 10 (1925): 30, quoted in Warren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136, 205, n. 43.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作以及他的支持者的著作<sup>①</sup>仍然得以出版。然而,无论他们的影响如何,并未能持续很长时间。1927年4月6日,拉狄克被解除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他通过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学生的接触也被切断了。据说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于1939年在劳改营被处决(1988年被平反)。

总而言之,尽管第三国际的主要任务是促进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但第三国际的代表中有许多犹太人,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团结,以及与国民党所依赖的民族资产阶级和资本家的团结,用列宁主义的术语来说,是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维经斯基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也推动了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而且他还坚持保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国民党的权利,以阻止“右倾偏差”。<sup>②</sup>

蒋介石一生都在依靠外国人——俄国人、德国人或者美国人,但是从来没有信任过他们(现在看来是有充分理由的)。<sup>③</sup> 然而,犹太人却不同。蒋介石认识到了犹太人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他1923年在莫斯科停留之后是这样说的:

在中国的国民革命中,大多数向孙中山表示敬意并且同中国真诚合作的俄国党政领导人都是犹太人,只有加米涅夫和契切林(Chicherin)是例外,他们是俄罗斯人(实际上加米涅夫也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引起了我特别的兴趣。我发现,比较而言,像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和越飞这些人更关心国民党和俄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问题。<sup>④</sup>

## 二、1949—1979年:沟通中国与西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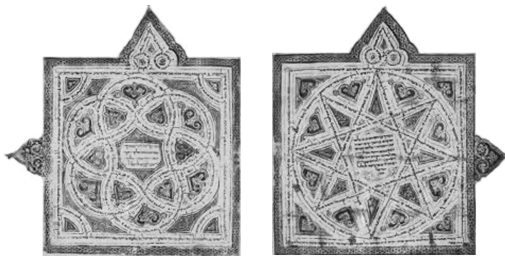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超过两万名犹太难民从欧洲逃到中国,绝大部分逃到了上海,也有少数去到其他地方。他们中一些人参加了共产党,并为之

① 其中一些人是犹太人,如贝拉·爱泼斯坦(Bella Epshtein)、亚伯兰·格里戈里耶维奇·普里戈任(Abram Grigorievich Prigozhin)、米哈伊·沃林(Mikhail Volin,即 Semen Natanovich Belenky,著名汉学家,中国研究所所长)。至少有一些中国学生称赞了他们。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171, 175, 178, 183, 295.

② Zhou Lisheng,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Tendency of Right Deviation in the Party during the Early GMD-CCP Cooperation: Voitinsky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8 (2016): 144-151.

③ 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8), 157.

④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Up at Seven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22.



提供各种服务,主要是医学和学术方面的专业服务。<sup>①</sup> 这些犹太人几乎没有在中国出生的,或者是自愿来中国的,他们之所以参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信仰,出于不仅要在中国而且还要在全世界推动革命运动的理想。

在参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犹太活动家中,有一些是美国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就是其中之一。李敦白的外祖父曾是俄国犹太革命家,受外祖父的影响,他在1940年18岁时就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并于1942年加入美国陆军。他决定学习汉语而不是日语,计划到中国去支援中国革命,以期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sup>②</sup> 他1945年9月抵达中国时,战争已经结束。作为一个生活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犹太人,他“从未感到被当地社会完全接受”。他知道自己所属的宗教:“我在那些圣经故事和古老的赞美诗中找到一些安慰,但我不相信有一个人形上帝。”<sup>③</sup>一般说来,他所遇到的中国人都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作为一名可以自由行动的士兵,李敦白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包括帮助几名地下党员逃避警察追捕。1946年年末或1947年年初的某个时候,在得到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和朱德等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批准后,李敦白成了一名中共党员<sup>④</sup>;他也是第一位成为中共党员的美国公民<sup>⑤</sup>。他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让西方知道中国共产党胜利的消息,而这些消息在中国之外往往被打折和受到忽视。

1949年,据说是根据斯大林命令,李敦白遭到逮捕。1955年4月获释后,中国方面承认对他的指控和监禁是错误的。李敦白并不是唯一在北京的犹太人,另外还有珍·萨克斯·霍德斯(Jane Sachs Hodes,高盛银行哈利·萨克斯

---

<sup>①</sup> M. Avrum Ehrlich, ed., *The Jewish-Chinese Nexus: A Meeting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8); Gerd Kaminski, ed., *Ich Kannte Sie Alle: Tagebuch des Chinesischen Generals Jakob Rosenfeld* (Vienna: Löcker Verlag, 2002); Pan Guang, *A Study of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1933-1945): History, Theory and the Chinese Pattern*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sup>②</sup>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13, 31, 144.本节中的许多内容都来自这本书。

<sup>③</sup>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161.

<sup>④</sup>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92-93.

<sup>⑤</sup> Barb Charzuk, “Ex-advisor to Communist China Dies at 98”, *The Fountain Hills Times* (August 14, August 27, 2019).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的女儿)<sup>①</sup>、乔希和米里亚姆·霍恩(Josh and Miriam Horn)、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以及逃离纳粹奥地利的弗兰克·苏(Frank Su)的妻子索尼娅(Sonia)等人。<sup>②</sup>李敦白在1967年担任过几个月中国广播事业局(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领导,当时“文化大革命”正不断恶化。一些中国人和外国人因嫉妒他的职位而对他进行攻击,用的是反犹太主义话语:“李敦白表现出了我们一直以来所熟悉的犹太人的各种品行。”<sup>③</sup>后来他被再次逮捕并被讯问关于当时也被捕入狱的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和迈克尔·夏皮洛(Michael Shapiro,一译夏庇若)的情况;大卫·柯鲁克也是如此,他们全都是犹太人。李敦白被监禁了近十年,到1977年11月才获释,并于1980年3月回到美国。尽管遭受了苦难,他仍然执着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并向外部世界传播中共的各种信息。早在1949年,北京就将他称为“一位在中国人和美国人民之间架设桥梁的工程师”<sup>④</sup>。事实上,这正是他和他的犹太伙伴们的重要使命。

李敦白回到美国后,仍在继续自己的使命,让西方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但更多的是用经济话语而非革命话语。“他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接受的采访比任何人都要多。”<sup>⑤</sup>更重要的是,他为在中国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开办了一家咨询公司。他利用个人关系和对中国制度的了解提供咨询服务,成了一个货真价实的资本家,赚取了数百万美元。<sup>⑥</sup>通过这样做,他身体力行地向世界展示毛泽东时代之后中国的做法——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这种前所未有的创新主要也是由犹太经济学家引入中国的。

爱泼斯坦也作出了类似的贡献,同样也经受了类似的痛苦。爱泼斯坦1915年出生于华沙,后全家来到中国,先是在哈尔滨,后到天津。美国和英国在天津

---

① 珍·霍德斯是一名资深共产党员,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生活了五年,编辑英语出版物,教授英语并在英语广播电台播音。Jane Hodes, “Lifelong Activist, Founder of Niebyl-Proctor Library,” *People's World* (June 18, 2009),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janehodes-lifelong-activist-founder-of-niebyl-proctor-library/>; Sonia R. Su, “What China Has Meant to Me,” in *Living in China*, ed. Rewi Alle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79), 127-145.她曾在外文局法语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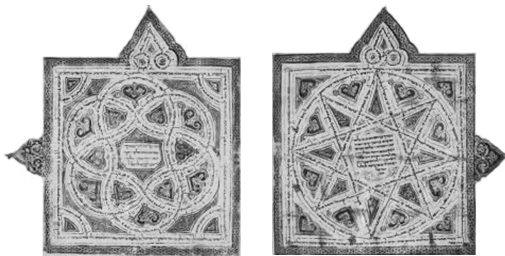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② Beverley Hooper, *Foreigners under Mao: Western Lives in China, 1949-197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③ Beverley Hooper, *Foreigners under Mao: Western Lives in China, 1949-1976*, 383.

④ Jonathan Margolis, “Sidney Rittenberg Obituary,” *The Guardian* (August 28, 2019).

⑤ Barb Charzuk, “Ex-advisor to Communist China Dies at 98,” *The Fountain Hills Times* (August 14, August 27, 2019).

⑥ Robert D. McFadden, “Sidney Rittenberg, Idealist American Aide to Mao Who Evolved to Counsel Capitalists, Dies at 98,”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9); Gary Rivlin, “A Long March from Maoism to Microsof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04).



都很有影响,爱泼斯坦因此接受的是英语教育,英语成了他的主要语言,并使他进入了新闻业。尽管如此,他父母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1917年俄国革命的影响,形成了他自己终生的政治倾向。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正统犹太教和欧洲启蒙现代主义的结合——这与中国改革者试图将传统儒家思想(“体”)与现实需要(“用”)相结合并无太大差别,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是一个国家,而犹太人却没有自己的国家。爱泼斯坦年幼时在哈尔滨目睹了白俄对“布尔什维克犹太人”所采取的残酷的反犹主义;这些“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一起被逮捕,遭受酷刑并被杀害。中国几乎没有反犹主义,其主要是白俄、日本人和西方人“带进来”的,并被一些国民党人士“接受”。爱泼斯坦回忆说,一名陪同外国记者前往共产党控制区的国民党官员告诉东道主,这些记者中有三个人是犹太人;他还说,他们只对金钱感兴趣,对“新闻”并不真正感兴趣。而且,因为犹太人没有祖国,他们肯定理解不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斗争的含义,所以他们应该相信他。不出所料,国民党官员的提议和建议遭到了拒绝。<sup>①</sup> 于是,有意或无意间,犹太人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形成了一条纽带。一些离开中国前往美国的犹太人成了工会活动家和共产党员。不可避免的是,随着俄国影响的增强,犹太特性消退了。爱泼斯坦写道:

虽然我父母都出生在虔诚的犹太家庭,但他们早已成为坚定的无神论者。我甚至直到成年后才见到犹太会堂内部的样子(虽然哈尔滨也有几座犹太会堂,但我从未进去过);也没人教过我希伯来语……我们没有进过犹太会堂,不在赎罪日禁食,也不遵守犹太洁食规矩或者逾越节的饮食规定,我没有接受过成人礼,这是对犹太男性长到13岁的确认,从此他们便应当承担成年人的道德责任……但是我们的无神论家庭却非常犹太化,以一种世俗的方式保持我们的犹太性。<sup>②</sup>

虽然不信教,但爱泼斯坦研究并熟悉犹太宗教和历史故事,他以及他的家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犹太身份,也没有更改自己的姓名。然而,他和他的父母都拒绝有神论和犹太复国主义;而且他还接受了共产主义,并认为向外部世界宣传中国的共产主义是自己的使命。爱泼斯坦曾在诸如合众国际社(UPI)等新闻机构和《纽约时报》工作过。他通过自己的写作,是“一位(中国)统一战线不知疲倦的

<sup>①</sup> Israel Epstein,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 CA: Long River Press, 2005), 181-182.

<sup>②</sup> Israel Epstein,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35, 39.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支持者”<sup>①</sup>。作为《中国建设》(*China Reconstructs*)杂志的创始人之一,他于1979年5月成为其主编。1983年,他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接纳为委员。全国政协的十位外籍委员中有一半是犹太人。在大多数中国面向外部世界的媒体中,犹太人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除了爱泼斯坦在《中国建设》和李敦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工作外,还有沙博理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后又在外文出版社工作,迈克尔·夏皮洛在新华社工作,大卫·柯鲁克在外语学院工作。

另一位帮助中国架起与世界沟通桥梁的犹太裔美国人是沙博理。他于1915年年底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学习过法律和中文,曾与另一位后来也来到中国的犹太人朱利安·舒曼(Julian Schuman,中文名叫舒子章)同住。<sup>②</sup>沙博理很清楚自己有犹太血统,尽管他和他父母认为自己是美国人。他最后一次与犹太教“相遇”是在1928年,当时他13岁,在犹太会堂里用希伯来语作了他的成人礼致辞。1989年,他访问了以色列,而在此之前他一直没有关注过以色列。他后来说:“这里就是它(犹太性)开始的地方,我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基本属性就是来自这里的。我找到了一个起源。”<sup>③</sup>毕业后,他进入了一家著名的华尔街犹太律师事务所。他于1947年3月离开纽约,并不是出于任何意识形态动机或有什么共产主义倾向,而是希望在北京的一家美国公司找一个商业律师的工作,同时提高中文水平。通过他的中国未婚妻,他接触到了共产党人,从而意识到自己想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sup>④</sup>沙博理没有(像李敦白那样)去联系共产党人,而是他们来找他。当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利用自己的中文知识,开始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希望它们能进入美国市场”。后来这导致了第一部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小说在美国出版。沙博理也很快受聘于对外文化联络局,成为各种书和小册子的翻译者。然而,他仍坚持自己“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sup>⑤</sup>

1953年,沙博理加入了中国刚刚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后来他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使命感、成就感和目标。”<sup>⑥</sup>到1961年时,他已经翻译了十多部

① Matthias Messmer, *Jewish Wayfarers in Modern China: Tragedy and Splendor* (New York, NY: Lexington Books, 2012), 2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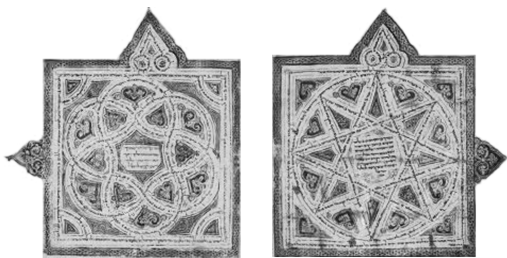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② Julian Schuman, *China: An Uncensored Look* (Sagaponack, NY: Second Chance Press, 1979).

③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79), 204-205; Sidney Shapiro, *I Chose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New York, NY: Hippocrene Books, 2000), 274.

④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24.

⑤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39, 42.

⑥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85.



小说和几十篇短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与抗日战争有关。他还常常为《中国文学》杂志工作,然后又为《中国画报》工作。他三十多年来的翻译工作,除了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现代和古典文学的特质以外,“还在向世界展示真实的中国方面起到了有效的作用。它们提供了我们的许多文章极为欠缺的筋骨和血肉。在我看来,其他国家的普通人一旦像我一样了解了中国人,就会情不自禁地喜欢和钦佩他们。在当前‘仇恨中国’的氛围中,面对面的交流是如此欠缺——文学媒介可能是次优的选择。”<sup>①</sup>

20世纪60年代早期,沙博理终于下定决心得到他最想要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在北京比在纽约更能从事有意义且满意的工作”,便于1963年申请了中国公民身份,几个月后获得批准。

大卫·柯鲁克于1910年出生在伦敦一个有东欧犹太血统的家庭。<sup>②</sup>他小时候接受过犹太传统教育,学了一些希伯来语,吃犹太洁食,守犹太节日,甚至还受到一点犹太复国主义的影响。受萧伯纳作品的影响,他逐渐放弃了宗教信仰,后来出国到了巴黎、德国和纽约之后,这种世俗化的倾向进一步加强了。随后,他的阅读、工作和经历大萧条引起了他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兴趣,也引发他对资本主义、失业和法西斯主义在世界蔓延的批评。不知不觉中,柯鲁克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1931—1935)参与了共产主义活动。他不久就加入了共产主义者领导的全国学生联盟。他从同伴以及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很多收获。他第一次读到列宁的《国家与革命》。1936年回到英国后,柯鲁克加入了共产党,并于1937年年初加入了国际纵队的英国防空营,同西班牙法西斯主义战斗。武器、训练和补给都来自苏联,西方民主国家采取“不干涉”立场。到4月,他被克格勃招募并开始监视反对苏联尤其是反对斯大林的“左翼分子”。他没有掩饰自己的犹太身份,并得到了一个新身份。<sup>③</sup>

1938年5月,按照苏联的命令,他前往上海,也受到了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他的正式身份先是在圣约翰大学后又在苏州大学教授文学,而非正式身份则主要是监视“托洛茨基分子”。他使用过

<sup>①</sup>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200-201.

<sup>②</sup>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www.davidcrook.net/simple/main.html](http://www.davidcrook.net/simple/main.html); Delia Devin, “A Communist Who Fought against Franco, Spied for Stalin and Wrote a Classic on Change in China,” *The Guardian* (December 18, 2000); Zhang Shu, “Professors David and Isabel Crook and Their Family,” *Voice of Friendship* 179 (2015): 41-45.

<sup>③</sup> 在西班牙的约4万名志愿者中,约有8000人是犹太人。在约2000名英国志愿者中,约有200人是犹太人,即10%,是他们在英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的10倍。1996年12月,柯鲁克应西班牙政府邀请,带着300名国际旅老兵返回西班牙。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哈罗德·艾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1938),艾萨克斯当时是一名坚定的托洛茨基分子(他本人也是犹太人)。1940年夏天,柯鲁克前往成都,在流亡中的南京大学任教,并于1942年回到伦敦,与一位在成都的加拿大传教士的女儿伊莎贝结婚。伊莎贝一家思想开明,愿意接受他的共产主义和犹太教信仰,尽管他早就脱离宗教了。他学习了英国皇家空军的情报课程,负责监视和破译日本的无线电通信,并成了一名军官。他先后驻扎在印度、锡兰和缅甸(在那里他晋升为空军中尉),最后来到香港,此时战争已经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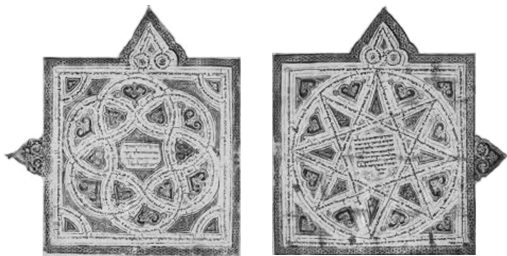
柯鲁克不久又被调到新加坡。由于被怀疑为苏联搞间谍活动,他遭到降职;三年的海外服役结束后,他回到了英国。1946年,他和伊莎贝决定返回中国。柯鲁克开始在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学院学习中文(他当时没有学汉字,直到20年后被关进监狱时他才开始学习汉字)和中国历史。学习结束后,他从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并获准前往中国。柯鲁克在继续参加共产党的活动时,仍对自己的犹太身份感到不自在,也没有加入犹太退役军人协会。

在前往北京的途中,他们在香港见到了后来成为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及其妻子、重庆的中共发言人龚澎以及后来成为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在天津,他们又见到了后来任中国驻美国大使的韩叙。在北京短暂停留后,从1947年11月下旬起,他们在十里店村住了八个月,写了三本书。在农村逗留期间,他们见到了廖承志(时任新华社负责人)、薄一波和邓小平。1948年6月,他们前往石家庄。在那里,在一位重要的外交官王炳南的要求下,他们同意在新设立的延安外国语学校授课,开启了他们终身的职业生涯。叶剑英当时是附近延安外国语学校的院长,后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国防部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也参与了此事。这项任务也使柯鲁克夫妇的第一本书的出版推迟了10年,直到1959年才出版。

20世纪50年代初,柯鲁克成为了英语系副系主任。外国的教师们一般都能克制自己的反犹主义,然而一些中国人却很欣赏他的犹太身份,于是,早年隐瞒了自己宗教信仰的柯鲁克再也没有试图继续隐瞒下去,当然也没有炫耀。与此同时,延安外国语学校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又改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柯鲁克将教学重点放在培养能够陪同外宾的口笔译人员,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教授文学上;他认为文学往好处说是“不实用”,往坏处说则是“比智力”。在他的数千名学生中,许多人“获得了外交部或者学术界的最高职务”<sup>①</sup>。

---

<sup>①</sup> Delia Devin, “A Communist Who Fought against Franco, Spied for Stalin and Wrote a Classic on Change in China,” *The Guardian* (December 18, 2000); Israel Epstein, “David Crook,” *China Today* (2001): 37.



1957年,柯鲁克到加拿大和英国待了六个月,发表了一些赞扬中国的宣传演讲。1958年,他经苏联返回中国。1966年夏天,他犯了一个错误——在“文化大革命”前夕离开中国;接着又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不久又返回了中国。1967年2月回国后,他加入了“红旗战斗队”,后来又加入了主要由外国人组成的“白求恩-延安革命兵团”。10月17日,红卫兵学生把他抓了起来,称他是英国间谍,将他投入了北京警戒级别最高的秦城监狱。在监狱里,他终于学会了中文。他于1973年1月获释。对他的指控修改了三次,一次比一次好,最后被彻底平反。在1973年3月的一次讲话中,已经生病和虚弱的周恩来总理在谈到外国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提到了一些人的名字:“大卫·柯鲁克现在已获释,我们向他表示歉意。”而迫害外国人的罪魁祸首江青,可能正被迫坐在那里。<sup>①</sup>1979年,教育部任命大卫·柯鲁克(和伊莎贝)为“学院顾问”,相当于大学校长的级别。<sup>②</sup>柯鲁克在北京恢复教职后,1972年开始担任为期六年的《汉英词典》首席母语顾问。

总之,柯鲁克认为自己在教育方面作出了贡献,在“宣传”(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方面也作出了贡献,比如写书、写文章和小册子和广播,但最重要的是,在中国顶尖的学术机构之一——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sup>③</sup>他还提出过改革中国教育制度和加强中外联系的建议。由于他的建议,中国取消了许多不准外国人访问某些地方的规定,这些地方原先只对中国人开放。

尽管柯鲁克认为自己是一名无神论者和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但他从未放弃与犹太教的关系。1979年10月,虽然他对赎罪日禁食的做法嗤之以鼻,也没有犹太教祈祷文,但他仍然记得“一些安息日的旋律”<sup>④</sup>。《中国日报》创刊后,他就各种问题向该报编辑寄了25封信。他的一些信被拒,例如关于反犹主义、军售以及中国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关系等。<sup>⑤</sup>1984年1月17日,柯鲁克给《中国日报》寄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中国日报》上的漫画是种族主义的……脸上有典型的犹太人鼻子,由犁头铸成的剑后面的大卫六芒星,这无疑是想谴责以色列前政府和现政府的好战和扩张主义。谴责他们是对的——特别是对于一个社会主义

<sup>①</sup>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189.

<sup>②</sup>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190.

<sup>③</sup>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203-204.

<sup>④</sup> Vera Schwarcz, *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e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4-175.

<sup>⑤</sup>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243-245, 250, 255.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国家来说。但是,不能通过嘲笑犹太人的身体特征或者许多世纪以来激励犹太民众与反犹主义斗争的标志……他们,犹太人民,应该被团结,而不是被侮辱。<sup>①</sup>

这封信没有被登载出来,也没有得到回复。而当时中国正在购买以色列的武器和军事技术,其中一些还在1984年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阅兵式上被展示——尽管柯鲁克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他(和迈克尔·夏皮洛)关于中国的看法经常受到《卫报》(的约翰·吉廷斯)和《每日电讯报》的诋毁。<sup>②</sup>

1986年,柯鲁克76岁时不无愧疚地访问了以色列。启程之前,他在纽约会见了一位以色列教授和一位以色列驻联合国官员。他和妻子经由埃及和西奈半岛前往以色列,重温了他的犹太教知识。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伊莎贝说:“我们的角色是扮演在中国的西方。”<sup>③</sup>然而,这一说法暴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西方和传教士态度。大卫·柯鲁克可能会改为“我们的角色是扮演在西方的中国”,或者在中国和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中国人在2010年他去世十周年、100周年诞辰时评价道:“他书写和讲述中国,在极度简单化的冷战背景下,向外界提供了一幅关于新中国的准确图景。”<sup>④</sup>

另一位成为彻底的亲中国代言人的英国犹太人是迈克尔·夏皮洛。<sup>⑤</sup>他出生在伦敦东区一个世俗的犹太家庭,尽管年轻时经历过反犹主义,但是他从未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谈到过他的宗教信仰。他对犹太事务没有兴趣,认为人类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是阶级。在伦敦经济学院(LSE)学习后,夏皮洛于1934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1949年或者是1950年,他“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邀请,受英国共产党派遣”<sup>⑥</sup>前往中国,被安排在中国国际新闻局。他的著作《变化的中国》于1958年在西方出版,一位评论家写道:“夏皮洛不仅对八年来的变化进

①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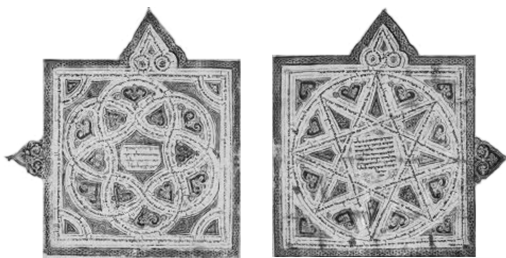
②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266.关于以色列对中国的军售问题,见 Yitzh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40 (1998); Yitzhak Shichor, “Proxy: Unlocking the Origins of Israel’s Military Sales to China,” *The Asia Papers* (2020).

③ Beverley Hooper, *Foreigners under Mao: Western Lives in China, 1949-197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

④ Li Qi, “Man of the People,” *China Daily* (October 20, 2010).

⑤ Neil Redfern, “Michael Shapiro: A Communist Life in Britain and China,” <http://www.academia.edu/4754354/>;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160.

⑥ 根据1986年10月6日新华社讣告。Neil Redfern, “Michael Shapiro: A Communist Life in Britain and China,” 7.



行了简要的概括,而且还对这一变化的内容进行了专业的分析。”<sup>①</sup>与他的同事不同,夏皮洛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外国共产党的,他批评苏联的“修正主义”和“改良主义”,将其与中国革命的纯洁性进行比较。然而,他和李敦白都是正式的外国共产党员,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过一段时间的红卫兵活动,所以经历的磨难也比其他外籍人士多。<sup>②</sup>

迈克尔·夏皮洛再也没有回英国,直到1986年去世,一共在华36年。他在新华社和外文出版社工作,还为面向海外的国内新闻部门编辑英文评论,并且翻译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著作。这就是在中国的西方“外国专家”——其中许多是犹太人——的主要任务,下文还将提到。<sup>③</sup>

1959年年底,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小组,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翻译成英文,并对20世纪50年代中期发行的前三卷的英文译文进行修改。这项工作从60年代初开始,翻译小组共有14人,其中9个中国人(包括受过牛津大学教育的学者,外交部、外语出版社和外语学院的官员和领导)以及5名外国人:李敦白、柯富兰(Frank Coe)、爱泼斯坦、索尔·爱德勒(Sol Adler)和迈克尔·夏皮洛——全都是犹太人。经过近两年的工作,1964年1月,毛泽东招待翻译组在勤政殿共进晚餐。柯富兰、爱德勒<sup>④</sup>、爱泼斯坦和李敦白一同前往。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受邀出席,正是她作为间谍在莫斯科被捕,才导致李敦白在中国也被捕。关于李敦白,毛泽东曾歉意地说:“我们在他的案子上犯了一个很糟糕的错误。他是一个好同志,我们冤枉了他。”<sup>⑤</sup>金诗伯(Sam Ginsbourg)于1914年出生在赤塔的一个犹太家庭,后全家逃离了白俄罗斯。他在1967年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通过逐字逐句地对比中文原文,检查了《毛主席语录》的英文和俄文译

<sup>①</sup> William H. Hinton, “Review of Changing China, by Michael Shapiro,” *Science & Society* 26 (1962).

<sup>②</sup> Anne-Marie Brady, “Red and Expert: China’s ‘Foreign Friends’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China Information* 6 (1996): 110-137; Anne-Marie Brady,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Friendship: Review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wo of China’s American Friends,”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9 (2002): 307-319.

<sup>③</sup> 以下段落来自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249-252.

<sup>④</sup> 关于索尔(所罗门)·阿德勒,见 Matthias Messmer, “China’s Realitie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Foreign Experts,’” in *The Jewish-Chinese Nexus: A Meeting of Civilizations*, ed. M. Avrum Ehrlich (London: Routledge, 2008), 22-23. 关于柯富兰,见 Walter H. Waggoner, “Frank Coe, in Peking; Former U.S. Official Took Asylum in 50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80)。从1958年到1980年,他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22年。

<sup>⑤</sup>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273. 另参见 Sam Ginsbourg, *My First Sixty Years in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本,并提出了改进建议”<sup>①</sup>。在狱中,柯鲁克(当时已被排除出翻译团队)试图“做得更好”：“我尝试翻译或重新翻译,我对毛泽东作品的官方英文译本的僵硬风格不满,想要一个忠于他时常活泼、朴实甚至有诗意的译本。”<sup>②</sup>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这些生活在中国的外籍犹太人正是在新闻领域特别是翻译和编辑以及在外语教学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向世界展示中国并让世界了解中国。

### 三、1979—2019年：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

在前30年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遵循毛泽东思想的设想,即共产主义可以通过越过资本主义阶段来实现。作为资本主义问题的专家,马克思起初认为,资本主义是实现共产主义不可缺少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然而,由于没有先例表明共产主义革命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也没有迹象表明共产主义革命将会很快发生,马克思在晚年失去了耐心,提出了一个选项,即依靠传统的社群主义(主要是在俄罗斯)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捷径,以绕开资本主义。<sup>③</sup>

40年后,列宁试图追随马克思的脚步,在俄国发动革命,但可能意识到这是行不通的。俄罗斯的农民经济过于落后和薄弱,无法创造在社会中用来分配的财富。因此,他提出了新经济政策<sup>④</sup>,允许通过自由市场和贸易的要素来重振经济发展。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以至于激起了党内的反对,而其中大部分反对者是犹太人,他们担心“资本主义复辟”会危害革命。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放弃了自由市场,并导致其最终解体。尽管中苏关系有起有落,但显然中国基本上是模仿了苏联的方式,试图绕过资本主义来实现共产主义。毛泽东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一对互相矛盾的概念,将它们组合在一起是反动的。<sup>⑤</sup> 其实,早在苏联解体之前,邓小平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就得出结论,没有经过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就无法实现共产主义。然而,他们却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已经由共产党领导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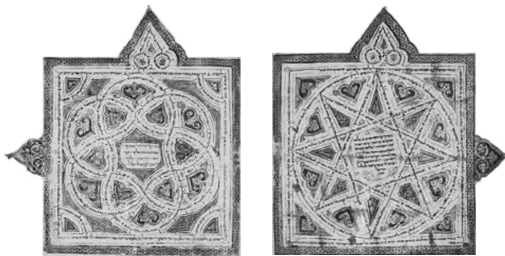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sup>①</sup> Sam Ginsbourg, “A Voyage into the Future,” in *Living in China*, ed. Rewi Alle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79), 39.

<sup>②</sup>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181.

<sup>③</sup> Th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Th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sup>④</sup> 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s: Sovie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sup>⑤</sup> The Revolutionary Mass Criticism Writing Group of the Party School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ory of ‘Combine Two into One’ is a Reactionary Philosophy for Restoring Capitalism,” *Beijing Review* 14 (1971): 6-11.



家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共产党从掌握政权的那一刻起,就坚持扼杀任何资本主义的苗头,而且将矛头对准“走资本主义道路者”——包括领导层。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的了解有限,并且缺乏坚实的资本主义基础,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便希望寻求外部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末,当中国的领导人决定进行广泛的经济改革时(一些人早在50年代初就有此想法),就邀请外国顶尖经济学家来华进行讨论。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犹太人。从历史上看,犹太人通常就与金钱(资本)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好是坏。

精通商业和银行业务,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在城市但流动性高,有全球范围的家族性联系,犹太人代表着现代性,是资本主义增长和发展背后一股重要的推动力。<sup>①</sup>马克思本人特别地将资本主义等同于犹太教。<sup>②</sup>犹太人在研究方面也很出色:所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40%和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的51%都是犹太人。第一批专家由代表着纯粹资本主义的美国人组成,他们都是研究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前沿、最受尊敬和最负盛名的学者。

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1976)、“世界主要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倡导者”<sup>③</sup>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于1979年年底被邀请访问中国。当他1980年9月来到中国时,意识到中国的学者/经济学家们对自由市场经济并不熟悉。在1988年9月的第二次访问中,他强调了“自由私有经济”的必要性,并驳斥了“双轨制”,即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虽然弗里德曼的一些观点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最初遭到了拒绝,但后来还是被部分接受了。他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1962)的中文版也于1993年出版。

1979年,另一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该代表团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劳伦斯·克莱因(Lawrence Klein, 198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率领,成员包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农业与资源经济系教授伊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哈佛大学的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 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sup>①</sup> Yuri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60; Werner 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trans. M. Epstein (Kitchener, Canada: Batoche Books, 2001).

<sup>②</sup>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211-241.

<sup>③</sup>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84. 下面的讨论大部分来自这本书,然而,这本书几乎没有提到“西方经济学家”的犹太人身份。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得主)——都是犹太人。他们在中国巡回授课并举行研讨会。1980年,克莱因又返回中国,为官员和学者们举办了一次计量经济学的强化研讨班。一年后,他被聘为中国重要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技术顾问”。<sup>①</sup> 1991年,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出生于意大利犹太家庭的弗朗哥·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 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中国人民银行举办了几次研讨会<sup>②</sup>,他是家庭和企业行为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也是犹太人。2007年3月,他在北京举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发表了演讲。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他鼓励中国采取实用主义,使其经济适应全球市场体系的需要。他还赞扬了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经济模式。<sup>③</sup>

第二个专家群包括原籍为匈牙利、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著名经济学家,早在共产主义阵营解体之前,这些国家就提出并进行了新的经济实验。他们中较早的一位是弗拉基米尔·布鲁斯[Włodzimierz Brus,原名为本雅明·齐伯尔伯格(Beniamin Zylberberg)],他早在1979年年底就首次访问了中国。作为一位在牛津大学工作的波兰流亡者,他坚持认为自由市场概念与社会主义既不矛盾,也不会取代社会主义,因而在中国引起了轰动。<sup>④</sup> 他认为规范的市场机制是一种能使中央计划更好、更有效也更有利地发挥作用的一种手段。他的观点极大地影响了包括孙冶方在内的中国主要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学家,深受20世纪60年代苏联著名经济改革家叶夫塞·利伯曼(Yevsei Liberman)的影响。利伯曼也是犹太人]。

另一位帮助指导中国后毛泽东时代经济改革的东欧社会主义改革者是奥塔·锡克(Ota Šik),他是一名在德国集中营里幸存下来的捷克犹太人,后在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68年布拉格之春时期担任副总理兼经济部长。<sup>⑤</sup>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他一直主张减少中央计划,扩大市场的作用。他1968年访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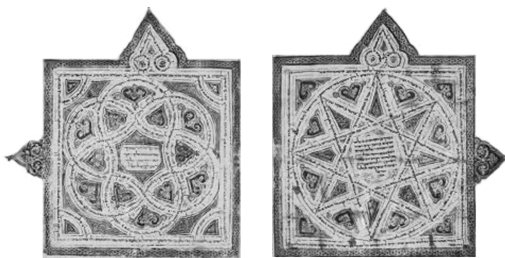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①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8, 58-59, 78-79, 253.

② 同上, 253。

③ Joseph Stiglitz, “China: Towards a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 (2008): 33-52.

④ Włodzimierz Brus,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72).

⑤ Ota Šik, “Eduard Goldstuecker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 Plan to Leave Again,” *JTA Daily News Bulletin* 36 (1969). “奥塔·锡克、爱德华·戈德斯图克回到捷克斯洛伐克,计划再次离开”,然而,后来他公开否认自己是犹太人,“犹太人对捷克前总理奥塔·锡克博士否认犹太血统感到惊讶”[“Jews Surprised by Denial of Jewish Ancestry by Former Czech Premier Dr. Ota Šik,” *JTA Daily News Bulletin* 36 (1969): 1-2]。



问南斯拉夫时,正好遇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于是他迁居瑞士,在那里度过了余生(2004年去世)。1981年,他访问了中国,与其他外国顾问一样,他也强调计划和市场相结合。他说,中央计划无法对整个经济作出正确和有效的决策,因为它忽视了市场的多样性和准确性,尤其是价格;而价格决定供求关系,从而产生可以提高生产和利润的物质刺激。然而,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社会主义市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在中央计划规定的范围内运作。<sup>①</sup> 锡克的建议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并被纳入中国的经济政策,导致了价格研究中心的建立。

在邀请西欧和东欧顶尖经济学家访华的同时,中国的经济专家也开始参加国际会议。国际经济学会雅典论坛(1981年8月)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与一些著名经济学家见面的机会,其中包括苏联犹太学者列昂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Kantorovich),也是唯一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苏联人(1975年),因为他为开发资源分配数学模型作出了贡献。另一个东欧经济学家代表团于1982年7月访问了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弗拉基米尔·布鲁斯、波兰国家物价专员尤利斯·斯特鲁明斯基(Julius Struminsky)、捷克前副总理季季·科斯塔[Jiří Kosta, 原名为海因里希·格奥尔格·科恩(Heinrich Georg Kohn)]、匈牙利官员和政治评论员彼得·肯德(Péter Kende),全都是犹太人。他们一致建议按照东欧模式来改革中国经济。<sup>②</sup> 但是,那些年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是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

在东欧经济学家中,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影响的是雅诺什·科尔奈。他原名叫科恩豪泽(Kornhauser),出生在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1984年移居美国并进入哈佛大学。在中国人1985年在一艘名为“巴山号”(Bashan)游轮上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他是主要嘉宾。他的著作《短缺经济学》(1980)抨击了社会主义官僚计划经济和长期缺乏增加生产的投资。“匈牙利人雅诺什·科尔奈是出现在战后共产主义欧洲的最著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sup>③</sup>在认识了科尔奈之

<sup>①</sup> Ota Šik,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67).

<sup>②</sup>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Jiří Kosta,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pproaches, Results and Prospects,” in *Crisis and Reform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ds. Peter Gey, Jiří Kosta and Wolfgang Quaiss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145-171.

<sup>③</sup> Robert Skidelsky, “Essay: A Chinese Homecoming,” (January 1, 2006), <https://robertskidelsky.com/2006/01/01/essay-a-chinese-homecoming/>; Robert Skidelsky, “Winning the Gamble with Commun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4 (2007).斯基德尔斯基勋爵(Lord Skidelsky)于1939年出生于中国哈尔滨的一个“寡头”家族(他本人语),父亲是犹太人。该家族在当地犹太社团和中国东北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后,中国的学者和经济学家们意识到西方经济学对中国发展的价值,他们不时会援引匈牙利的经验,参考科尔奈的著作。

中国的经济顾问们主张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的制度作为经济转型的一个阶段,但并不认为这个阶段是稳定或持久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共存,但最终会走向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然而,科尔奈和他的同事们——他们代表了东欧的转型风格,认为政治改革作为拯救本国经济的必由之路——却没有向中国提出这样的解决方案。科尔奈呼吁减少政府的“家长式作风”,即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他强调中国的“合同责任制”,减少强制性计划,并强调间接管理。

中国主要的经济学家和经济出版物称赞科尔奈对高等数学的运用,以及他把西方经济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东欧的经济改革,特别是匈牙利经济改革,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他的观点在西方与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同时,他也表示,这种计划经济与市场力量的结合只是一种“过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科尔奈在中国的声誉已经发展到惊人的水平”,达到了“科尔奈热”的程度。<sup>①</sup>这不仅反映了他的智力和能力(西方经济学家也拥有的),还反映了他的东欧经验(西方经济学家所欠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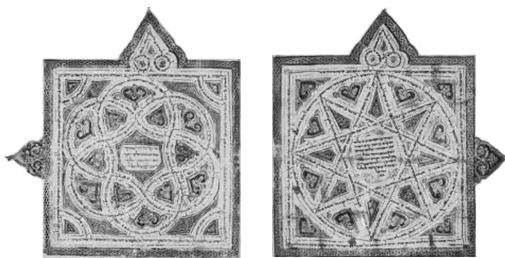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尽管他们热衷于将中央计划和自由市场结合起来,但并非所有的中国领导人和经济学家都接受社会主义改良模式,无论这种模式是东欧的还是西方的。一些强硬的保守派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推崇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并且相信其他经济学家。其中一位是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他出生在法兰克福,父母是波兰犹太人,后来移居比利时;他在那里为马克思主义辩护,直到1995年去世。他的著作《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1962年出版,1979年被翻译成中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那些反对改革的人用这本书来与改革派作斗争,但结果是失败的。<sup>②</sup>

总而言之,后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不太可能意识到他们的大多数外国经济顾问,无论是来自西欧的还是东欧的,都有犹太人身份。同样,这些顾问也不太可能将他们的犹太身份视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一种动力或者工具。事实上,一些苏联知识分子和官员曾暗示基辛格和一些著名美国犹太人有一种“犹太复

---

<sup>①</sup>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66.

<sup>②</sup>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77-78.



国主义阴谋”，要将资本主义引入中国（以及苏联）。<sup>①</sup> 然而，即使双方都没有意识到或忽略了这些顾问的犹太血统，犹太特性（Jewishness）可能已经改变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改革的基础。它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组合，以前从来没有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完成过，更不用说成功了。无论东欧国家经历了什么样的经济改革，它们都没有保持“社会主义”，更不用说“共产主义”了。也许犹太人的思维提供了灵活的知识独创和概念创新，这是其他人所想不到也做不到的。将中国从落后的中央集权和旧式经济转变为融合了资本主义元素的先进现代经济，是犹太知识分子敢于面对，也准备面对的巨大挑战。大多数学者、政治家以及媒体，都怀疑这种大规模转型是否可能。然而，到目前为止，中国 40 多年来的成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也是史无前例的。

## 结 论

本文讨论的这些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作出了贡献的各式各样的人物有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客观的、无可争辩的共同点——他们都是犹太人；另一个是主观的、显而易见的共同点——他们的犹太属性并不是他们的基本身份。我不同意第二种看法。诚然，中国（或其他地方）的犹太革命者可能从未踏入过犹太会堂，但是他们世代代都在吸收自己的犹太信仰。<sup>②</sup> 马克思（在中国人眼中是犹太人）所描绘的共产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真实的而非乌托邦式的——可以被视为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救赎或纠正（*Tikkun 'Olam*，“修复世界”——希伯来-犹太人的说法）。中国的犹太革命者肯定被有意无意地定义成了犹太人。爱泼斯坦提到，周恩来在正式访问华沙的招待会上问起了波兰著名数学家利奥波德·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教授。由于英菲尔德是犹太人，被安排在一个角落里，看着周恩来穿过大厅前来与他握手，“这是一种不赞成社会主义国家有反犹太主义的明确无误的姿态”<sup>③</sup>。

当然，最终的问题不仅在于这些犹太活动家如何定义自己，而且也在于其他人如何定义他们。犹太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原因是，这一运动被认为是

---

<sup>①</sup>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150.

<sup>②</sup> 他们是“不信教的犹太人”。参见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由于没有祖国，犹太人无论住在哪里都是与众不同的，这有助于他们保持自己的身份，而不一定靠宗教信仰。

<sup>③</sup> Israel Epstein,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242.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国际主义和普世性的。犹太人没有祖国,主要过着流散生活,共产主义运动非常适合他们。但是,如果说他们在 20 世纪 20 年代还没有理解共产主义运动的话,那么在 30 年代,当数十名犹太革命者被清洗和处决时,他们就肯定理解了;当时终于证明这种革命是民族性的,尤其是俄罗斯人的。犹太人被排除在外,不仅因为传统的反犹主义,而且还因为他们拒绝革命中狭隘的俄罗斯属性。无论如何,这两种态度都凸显了他们的犹太宗教身份,无论他们在感觉上和实际上离理论和实践有多远。<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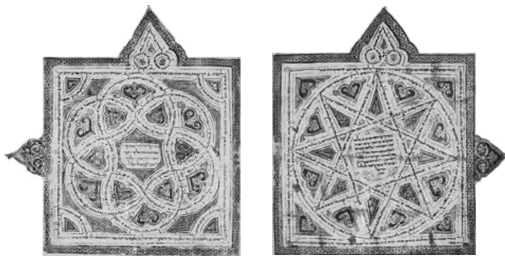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在上述三个时期里,犹太人对中国革命贡献的共同点是,他们试图“正确地”处理中国国内外的意识形态矛盾,弥合分歧。正如亚历山大·卢金(Alexander Lukin)所评论的那样,苏联对华政策的分歧,以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不是制度上的,而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sup>②</sup>从本质上讲,20 世纪 20 年代和 80 年代一样,他们关注的是“左派”观点和“右派”观点之间的差异——“左派”着眼于革命的共产主义本质,而“右派”则专注于革命的资产阶级前提。当然,最终政策是由莫斯科制定的,通常是由党制定的。然而,由于苏联特使们更熟悉中国当地的情况,他们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也有自己的偏好。犹太顾问们的建议是左右结合,“两者兼而有之”,很符合中国的传统。这也符合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即资本主义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而且,即使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些人肯定意识到了,这些思想也都符合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即对立统一、阴阳原则以及一些西方和黑格尔的概念。<sup>③</sup>

在第一个时期,大多数代表苏联政府或苏联共产党的犹太顾问都强调了与国民党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性。他们与马克思尤其是列宁的观点保持一致,赞同中国国民党对民族主义和独立运动的推动,以及依靠资本主义来发展中国。这两点都被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在第二个时期,当中国的社会主义被认为已经“实现”了的时候,大多数参与革命的犹太人试图通过翻译和出版中国的资料和著作,将它们介绍到国外,以此来弥合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差距。在第三个时期改革即将开始时,犹太顾问们——他们自己不一定是共产主义者——又重新回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即资本主义是共

<sup>①</sup> Leonard Shapiro, “The Role of the Jew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0 (1961): 166-167.

<sup>②</sup>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82, 109.

<sup>③</sup> V. J. McGill, and W. T. Parry,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 Dialectical Principle,” *Science & Society* 12 (1948): 418-444.



产主义的重要基础。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犹太顾问提供了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相结合以弥合差距的办法,并“正确地”处理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他们可能在无意间颠覆了马克思,指出了一种新的革命道路;这种革命取得成功的前景虽然仍存在疑问,但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最后,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些“沟通者”都是犹太人,而中国领导人和活动人士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一点?再进一步说,如果他们没有想到——也很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来自外部的信息(过去是反犹太主义,现在则是媒体渠道)也会提醒他们这一点。最近的迹象表明,中国认识并赞赏犹太文明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亚洲(和世界)文明产生的影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9年5月15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的开幕词中说:“在数千年发展历程中,亚洲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文明成果。《诗经》《论语》《塔木德》《一千零一夜》《梨俱吠陀》《源氏物语》等名篇经典。”<sup>①</sup>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主席提到了《塔木德》,而不是《圣经》。我想有两个原因。首先,《圣经》虽然最初只是犹太人的,但后来也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共有,它们都认为这也是它们遗产的一部分。其次,因为《塔木德》相较于《圣经》而言更是犹太人独有的财产,更能代表和反映犹太人的精神和本性,即争论和辩论,不接受事物表面的价值、主张对立的统一、协调分歧、调和矛盾。

可以想到的是,习近平主席在提到亚洲文化成就时把中国经典(《诗经》《论语》)放在最前面;但想不到他会把犹太人的《塔木德》排在第二位。在此之后,他才提到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日本人的贡献。假如不是习近平主席本人,那么一定是有中国领导层或知识分子中的其他人提议给予犹太文明如此高的地位。而且,由于中国政治中很少有或者根本没有巧合,这一点就很重要了。

##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2. 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monk, NY: M.E. Sharpe, 2003).

3. Albert S. Lindemann, *Esau's Tears: Modern Anti-Semitism and the*

---

<sup>①</sup>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演讲全文,可访问 <https://eng.yidaiyilu.gov.cn/home/rolling/90755.htm>, 2019年7月12日。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Rise of the J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4. Anna Geifman, *Thou Shalt Kill: Revolutionary Terrorism in Russia, 1894-1917*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Anne-Marie Brady, “Red and Expert: China’s ‘Foreign Friends’ in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China Information* 6 (1996).

6. Anne-Marie Brady,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Friendship: Review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wo of China’s American Friends”,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9 (2002).

7. Bruce A. Elleman, “Soviet Diplomacy and the First United Front in China,” *Modern China* 21 (1995).

8. Bruce A. Elleman, *Wilson and China: A Revised History of the Shandong Ques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2002).

9. Barb Charzuk, “Ex-advisor to Communist China Dies at 98”, *The Fountain Hills Times* (August 14, August 27, 2019).

10. Beverley Hooper, *Foreigners under Mao: Western Lives in China, 1949-1976*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11. Chen Kun, “Voitinski’s Visit and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 *Journal of Xichang College,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8 (2016).

12. C. Martin Wilbur, and Julie Lien-ying How, *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Soviet Advisers and Nationalist China, 1920-1927*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Chiang Kai-shek,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Up at Seven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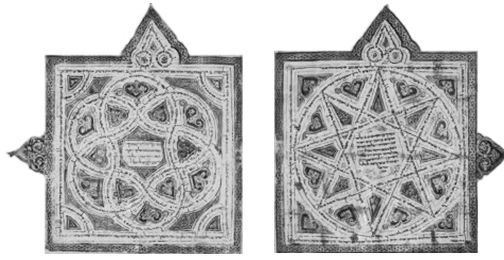
14.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15. David Crook, *Hampstead Heath to Tian An Men: The Autobiography of David Crook*, [www.davidcrook.net/simple/main.html](http://www.davidcrook.net/simple/main.html).

16. Delia Devin, “A Communist Who Fought against Franco, Spied for Stalin and Wrote a Classic on Change in China,” *The Guardian* (December 18, 2000).

17. Dan N. Jacobs, *Borodin: Stalin’s Man in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18. Grigorii Andreevich Gershuni, *Gershuni Memoirs*, trans. A. S.



Rabinovitz (Jaffa: Eitan and Shoshani, 1919).

19. Grigoriĭ Andreevich Gershuni, *From My Recent Past: Memoirs of a Revolutionary Terrorist*, trans. Katya Vladimirov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5).

20. Gary Rivlin, “A Long March from Maoism to Microsoft,”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5, 2004).

21. Gerd Kaminski ed., *Ich Kannte Sie Alle: Tagebuch des Chinesischen Generals Jakob Rosenfeld* (Vienna: Löcker Verlag, 2002).

22. Hu Yunxia and Li Shaohua, “The Contribution of Voitinski,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Russian (Bolshevik) Communist Party,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Journal of 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10 (2009).

23. Isaac Deutscher, *The Non-Jewish Jew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24. Israel Epstein, “David Crook,” *China Today* (2001).

25. Israel Epstein, *My China Eye: Memoirs of a Jew and a Journalist* (San Francisco, CA: Long River Press, 2005).

26. Jane Hodes, “Lifelong Activist, Founder of Niebyl-Proctor Library,” *People’s World* (June 18, 2009), <https://www.peoplesworld.org/article/janehodes-lifelong-activist-founder-of-niebyl-proctor-library/>.

27.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28. “Jews Surprised by Denial of Jewish Ancestry by Former Czech Premier Dr. Ota Sik,” *JTA Daily News Bulletin* 36 (1969).

29. John Crump, *The Origins of Socialist Thought in Japan* (London: Croom Helm, 1983).

30. Jiĭ Kosta,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Approaches, Results and Prospects,” in *Crisis and Reform in Socialist Economies*, eds. Peter Gey, Jiĭ Kosta and Wolfgang Quaisser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7), 145-171.

31. Joseph Stiglitz, “China: Towards a New Model of Development,” *China Economic Journal* 1 (2008).

32. Julian Schuman, *China: An Uncensored Look* (Sagaponack, NY: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Second Chance Press, 1979).

33. Jonathan Margolis, "Sidney Rittenberg Obituary," *The Guardian* (August 28, 2019).

34. Karl Marx, "On the Jewish Question," in *Early Writing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5).

35. Karl Radek, "Voprosy Kitaiskoi Revoliutsii," *Krasnyi Internatsional Profsoiuzov* 10 (1925), quoted in Warren Lerner, *Karl Radek: The Last Internationalist*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36. Li Qi, "Man of the People," *China Daily* (October 20, 2010).

37. Lu Mengyao, "Voitinski and the Propagation of Marxism in China," *Journal of Nant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hipping College* 13 (2014).

38. Leonard Shapiro, "The Role of the Jew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e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40 (1961).

39. M. Avrum Ehrlich, ed., *The Jewish-Chinese Nexus: A Meeting of Civil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08).

40.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 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3).

41. Mao Zedong, "The Great Union of the People," *Collected Works of Mao Tse-Tung*, Vol. 1-2 (Hong Kong: JPRS 71911-1, 1978).

42. Matthias Messmer, "China's Realitie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Foreign Experts'," in *The Jewish-Chinese Nexus: A Meeting of Civilizations*, ed. M. Avrum Ehrlich (London: Routledge, 2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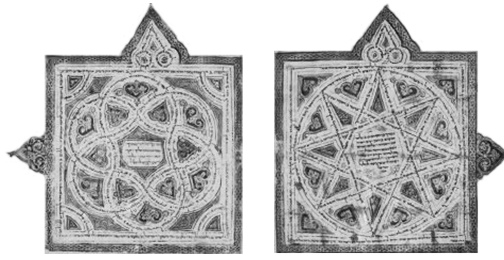
43. Matthias Messmer, *Jewish Wayfarers in Modern China: Tragedy and Splendor* (New York, NY: Lexington Books, 2012).

44.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ull Text of Xi's Speech at Opening of CDAC," *Belt and Road Portal*, <https://eng.yidaiyilu.gov.cn/home/rolling/90755.htm>.

45. Nagatomi Hirayama, "'Young China' in Europe: The Lives and Politics of the May Fourth Youth in France, 1919-1923," *Historical Research* 91 (2018).

46. Neil Redfern, "Michael Shapiro: A Communist Life in Britain and China," <http://www.academia.edu/4754354/>.

47. Ota Šik, "Eduard Goldstuecker Return to Czechoslovakia, Plan to Leave Again," *JTA Daily News Bulletin* 36 (1969).



48. Ota Šik, (1967), *Plan and Market under Socialism*,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49. Peter Zarrow,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50. Pan Guang, *A Study of Jewish Refugees in China (1933-1945): History, Theory and the Chinese Pattern* (Singapore: Springer, 2019).
51. Paul Bailey, "The Chinese Work-Study Movement in France," *The China Quarterly* 115 (1988).
52. Robert Skidelsky, "Essay: A Chinese Homecoming," <https://robertskidelsky.com/2006/01/01/essay-a-chinese-homecoming/>.
53. Roger Pethybridge, *One Step Backwards, Two Steps Forwards: Sovie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54. Robert D. McFadden, "Sidney Rittenberg, Idealist American Aide to Mao Who Evolved to Counsel Capitalists, Dies at 98,"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2019).
55. Robert Skidelsky, "Winning the Gamble with Commun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54 (2007).
56. Sidney Shapiro, *An American in China: Thirty Year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79).
57. Sidney Shapiro, *I Chose China: The Metamorphosis of a Country and a Man* (New York, NY: Hippocrene Books, 2000).
58. Sidney Rittenberg and Amanda Bennet, *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 (New York, NY: Simon and Schuster, 1993).
59. Sam Ginsbourg, "A Voyage into the Future," in *Living in China*, ed. Rewi Alle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79).
60. Sam Ginsbourg, *My First Sixty Years in China*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2).
61. Seth J. Frantzman, "Was the Russian Revolution Jewish?" *The Jerusalem Post* (November 15, 2017).
62. Sonia R. Su, "What China Has Meant to Me," in *Living in China*, ed. Rewi Alley (Beijing: New World Press, 1979).
63. The Revolutionary Mass Criticism Writing Group of the Party School under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ory of

#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3辑

‘Combine Two into One’ is a Reactionary Philosophy for Restoring Capitalism,” *Beijing Review* 14 (1971).

64. Tony Saich,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during the Era of the Comintern (1919-1943),” in Juergen Rojahn, “Comintern and National Communist Parties Project,”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 Amsterdam, [https://www.academia.edu/24398395/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_DURING\\_THE\\_ERA\\_OF\\_THE\\_COMINTERN\\_1919-1943](https://www.academia.edu/24398395/THE_CHINESE_COMMUNIST_PARTY_DURING_THE_ERA_OF_THE_COMINTERN_1919-1943).

65. Theodor Shanin, *Late Marx and the Russian Road: Marx and the Peripherie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NY: Th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66. Theodore H. White, *In Search of History: A Personal Adventure*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8).

67. Vera Schwarcz, *Long Road Home: A China Journe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68. Vadim Abramov, *Evrei v KGB: Palatschi i Zertwy* (Moscow, 2005).

69. V. J. McGill, and W. T. Parry, “The Unity of Opposites: A Dialectical Principle,” *Science & Society* 12 (1948).

70. Viktor Mikhailovich Chernov ed., *Grigori Gershuni: Zayn Lebn un Tetigkayt* (New York: Aroysgegeben fun Griori Gershuni Sots. Rev. Br. 247, 1934).

71. Walter H. Waggoner, “Frank Coe, in Peking; Former U.S. Official Took Asylum in 50s,”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6, 1980).

72. Włodzimierz Brus, *The Market in a Socialist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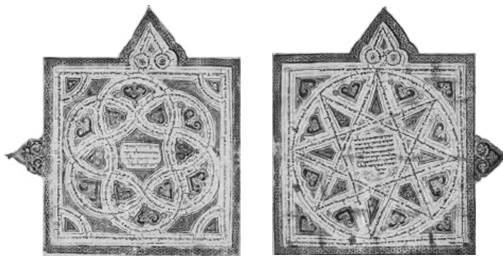
73. William H. Hinton, “Review of Changing China, by Michael Shapiro,” *Science & Society* 26 (1962).

74. Werner Sombart, *The Jews and Modern Capitalism*, trans. M. Epstein (Kitchener, Canada: Batoche Books, 2001).

75. Yoshihiro Ishikawa,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76. Yitzhak Shichor, “Israel’s Military Transfers to China and Taiwan,” *Survival* 40 (1998).

77. Yitzhak Shichor,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1919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n East Asia: Three Narratives (in Hebrew),” *Zmanim (Times)* 132 (2015).

78. Yitzhak Shichor, “Proxy: Unlocking the Origins of Israel’s Military Sales to China,” *The Asia Papers* (2020).

79. Yuri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80. Zhang Shu, “Professors David and Isabel Crook and Their Family,” *Voice of Friendship* 179 (2015).

81. Zhou Lisheng, “On the Rectification of the Tendency of Right Deviation in the Party during the Early GMD-CCP Cooperation: Voitinsky as the Focus of Research,” *Social Sciences* 8 (2016).